



当代澳大利亚 有效课堂教学行为变革研究



张树德◎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广西科技大学(筹)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当代澳大利亚 有效课堂教学行为变革研究

张树德◎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澳大利亚有效课堂教学行为变革研究 / 张树德
著. —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672-0354-9

I. ①当… II. ①张… III. ①课堂教学-教学研究-
澳大利亚-现代 IV. ①G4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3098 号

书 名: 当代澳大利亚有效课堂教学行为变革研究

作 者: 张树德 著

责任编辑: 王 娅

策划编辑: 杨 华

装帧设计: 刘 俊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社 址: 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 215006

印 装: 苏州市大元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 www.sudapress.com

E - mail: yanghua@suda.edu.cn

邮购热线: 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 0512-65225020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张: 9.5 字数: 273 千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0354-9

定 价: 29.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 0512-65225020

《当代澳大利亚有效课堂教学行为变革研究》是张树德教授“当代课程改革成功机制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二。如果说作者于2008年出版的《当代课程改革成功机制研究：澳大利亚经验和启示》是对澳大利亚课程改革得以广泛推进的宏观理解的话，那么此书则是对澳大利亚将课程改革进一步推进到课堂的微观描述与分析。课程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渐进和深化的过程。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但是，不管如何，课程改革的主战场在课堂，重中之重是课堂教学行为的变革。可以说，如果课堂教学行为没有发生变革的话，那么谈论任何课程改革的最终成功都为时过早。毕竟，课堂教学行为是否变革，或者是否有效，都会最终影响学生的学习质量。其中，课堂教学变革行为的发轫机制非常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

张树德教授撰写的《当代澳大利亚有效课堂教学行为变革研究》不仅是一本具有启示价值的专著，而且有助于深化我国的素质教育和基础课程改革。我以为，本书凸显了如下特点。

- 作者选择澳大利亚北方地区的语言课堂教学行为作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广泛探讨了该地区有效课堂教学变革的必要机制。

- 作者提出了有效课堂教学行为变革的必要标准,即“智力品质维度”、“高质量环境援助维度”和“意义性维度”,其分析框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 作者针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现状,提出了一系列有见地的建议,如发展高质量的教师教育,设计可操作的课堂教学管理框架,开展基于学校整体幸福的教师专业发展,等等。

- 该书思路清晰,观点明确,内容丰富,材料翔实,框架严谨且可读性较强。

我乐意向广大读者推荐这本专著。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系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王斌华

2012年7月21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 一、研究的缘起 1
- 二、研究的意义 11
- 三、概念诠释 12
- 四、研究路径和方法 13
- 五、本书的基本框架 15

第二章 当代澳大利亚有效课堂教学变革的原因 18

- 一、教育标准化运动的影响 18
- 二、当前学习理论的影响 34
- 三、结语 53

第三章 当代澳大利亚有效课堂教学变革的概念框架 57

- 一、概念诠释 57
- 二、有效课堂教学变革的原则 59
- 三、当代澳大利亚有效课堂教学变革的组成维度 66
- 四、结语 77

第四章 当代澳大利亚有效课堂教学变革中的智力品质要求 84

- 一、概念界定 84
- 二、智力品质变革的内容和要求 85
- 三、智力品质在有效课堂教学中的具体行为体现 93

四、结语	117
第五章 当代澳大利亚有效课堂教学变革中的高质量学习环境要求	119
一、概念界定	119
二、高质量学习环境变革的内容和要求	124
三、高质量学习环境在有效课堂教学中的具体行为表现	135
四、结语	142
第六章 当代澳大利亚有效课堂教学变革中的意义性要求	144
一、概念界定	144
二、意义性变革的内容和要求	150
三、意义性在有效课堂教学中的具体行为表现	161
四、结语	169
第七章 当代澳大利亚有效课堂教学变革的特点	171
一、设计性	171
二、可操作性	177
三、专业发展性	191
四、结语	193
第八章 当代澳大利亚有效课堂教学变革对我国的启示	195
一、要发展高质量的教师教育	200
二、要进行有效课堂教学设计	216
三、要促进基于学校安全与幸福的教师专业发展	242
四、结语	269
参考文献	271
后 记	297

第一章

导言

一、研究的缘起

本书是拙作《当代课程改革成功机制研究:澳大利亚经验和启示》的研究续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署提出,在课程变革领域,当前亚太教育创新为发展服务计划(APEID)的新重点是“达到全民教育的六大目标,课程变革要确保其相关性并提高学习质量”^①。

《当代课程改革成功机制研究:澳大利亚经验和启示》一书也提出,尽管澳大利亚的课程改革至21世纪初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澳大利亚的课程改革遇到了以下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②

(1) 还没有形成课程教学与学生学习结果的有效联结

在澳大利亚,尽管第一阶段(从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的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由于其关注的重点是校本管理、着重考虑学校职能的分配及资源的管理方式、注重系统性的变革,不注重教科书与测试及标准的有效联结,校长们对改革计划的信心度呈逐步下降的趋势。

① 王斌华,姐媛媛,张树德.领导和促进课程变革:提升资源能力包.曼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署,2005:导言.

② 张树德.当代课程改革成功机制研究:澳大利亚经验和启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179—182.

(2) 课程改革还没有真正进入到课堂层面,可操作性的教学模式有待发展

课程改革的目标最终要靠课堂来落实。卡德威尔和希尔(Caldwell, B. J. & Hill, P. W. 1996)(转引自 Pascoe, S. & Pascoe, R. 1998)就明确提出,如果澳大利亚改革的目的是旨在达成部长在 1993 年提出的“政府学校的下一个必要阶段是提高学生的学习结果”的目标,那么,只有当学校强调课堂教学层面的变革时,提高教育结果的真正可能性才能存在。^①

史密斯等人(Smith, M., et al. 1996)也认为,澳大利亚的下一步改革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它不但要变革学校的结构,而且其传递给学生的内容及教学也必须变革”^②。

奥登和奥登(Odden, A. & Odden, E. 1996)也说,“澳大利亚第一阶段可以结束了。这一阶段是设计各种组成要素与初步的实施”。但他们就如何进一步推进课程改革提出了忠告:“第二阶段可能需要更多的重构以便继续实施并产生所希望的结果——即学生达成高标准的结果。”他们又说:“(第二阶段)是该到了需要‘推进与充实’的时候了,也是到了参与学校需要‘学习’新方法(尤其是新的人员及评价实践的方法)的时候了。”他们特别提出了改革使学校工作量增加的问题,并“希望随着新条件的出现,学校不仅会作出各种努力,并会找到一些更具智慧性而不是更艰苦的工作方法”。^③

(3) 还没有形成高质量的援助性学习环境

价值观、关系的预期与质量(尤其是师生之间)构成了高质量的援

① 张树德. 当代课程改革成功机制研究: 澳大利亚经验和启示.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8: 179—182.

② Smith, M., et al. (1996). Research-based school reform: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agenda. In E. Hanushek & D. Jurgensen(eds.), *Improving America's Schools: The Role of Incentives*.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p. 21.

③ 转引自: Caldwell, B. J. & Hayward, D. K. (1998) *The Future of Schools: Lessons from the Reform of Public Education*. London: Falmer Press, p. 112.

助性环境的范畴。譬如,学生在多大程度上用于课堂任务的时间,学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保护使其免受干扰,为了教师发展的(特别是用于专业发展及学校教学与课程需要密切相连的教职员发展的)资源分配是否存在,学校亚文化及环境风气是怎样的,学生与教职员亚文化以及学生与教职员亚文化的互动方式是否存在联系,具体教师、部门及整个学校的价值观之间是否存在密切联系,等等,所有这些都影响着教师对改革的态度。此外,如果具体教师的价值观念和行动与那些部门及学校的价值观念和行动的差异越大,那么教师就越有可能体验低层次的工作满意度及高层次的压力,由此它越发引起教师对改革的信心不足。

在澳大利亚,尽管在其第一阶段也出现了将有关学习的价值观念整合于关键学习领域中的探索,但真正困难的是作为校长对课程变革的领导。特别是世纪之交,由于联邦政府加强了价值观教育,制订了国家性的价值观教育框架,他们必须在国家框架下发展适合各地实际的共享价值观念,其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也正是由于这个方面的原因,许多年轻教师不愿申请校长级的职位。同样因为这个方面的原因,发展这样的学校文化也就成了澳大利亚第二阶段改革的重点。

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 A. 2009)也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学校教育政策经历了四轮改革浪潮。其中第一轮教育改革始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止于20世纪70年代。在这个时期,许多学生就因为较早从事非职业性岗位需要而从学校毕业。教育的异质性及学校与教师的大量自主性,使传统的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方法得以与各种实验性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共存。该时期教学的典型特征是“呈现主义”(presentism),强调短期效果。第二轮教育改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到21世纪初期结束,该时期改革的重点是引入市场化与标准化。许多教师抱怨说,他们丧失了专业性判断的领域,而且教师们的士气下降了。第三轮教育改革从21世纪初期开始到2010年结束,主要涉及宽泛的方法改革。该时期教育改革的特点是“对目的施加了更严格的管理,同时也强调需要实施更灵活的和谐性手段”。改

革特别关注标准化测试,关注数据分析,不太考虑更深入地投入到教与学中去。该时期的教育改革还鼓励使用一种“适应性的”,甚至是“上瘾性的”呈现主义,这样的呈现主义默许或过度追求狭窄界定目标的激进性人工改革。譬如,“芬兰学校领导的个案研究”,对伦敦条件不利的多种族陶尔哈姆莱茨区(Tower Hamlets)非常成功的跨校合作研究,由加拿大阿尔伯塔实施的学校发动改革的 AISI 研究,以及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实施的结合特殊群体需要与普通教育改革的行动,等等。这四个项目就是该轮教育改革趋势的集中体现。第四轮教育改革从 2010 年起实施,强调变革与创新。变革与创新将拓展当前有关教育的合适地位与作用研究,转向将标准化成为教育思维的主要驱动力。当前对基于“基础”的测试结果的关注将让位于为社区参与做负责任的社会性准备。为此,各领域的教师与学校要更加深度性地互相援助。政府政策将日益促进学生成绩与幸福感的提高。政府政策的达成途径不是通过学校实践的“更少的可变因素”,而是通过发展援助性的社区与家庭能力。学校领导将日益改善在各种跨学校专业学习共同体内的环境。领导者在构建适应新形势的领导能力的同时将援助人员和成绩不佳的学校,并开始“放手”自己的学校。年轻一代的领导者将运用更接近学生的教学风格与技术。综合性的标准化测试将被放弃使用,原因是这样的测试成本太高,难以支持。^①

就课程变革而言,课堂是课程改革的主战场。由于质量是教育改革永恒的主题之一,因此,开展高质量课堂教学行为改革就成了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世界各国(地区)课程改革的一个主要方面。实际上,教学是课堂教学中影响学生学习的最重要的因素,教学方式质量对学生的学习效果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如希尔等人(Hill, R. W., et al.

^① Hargreaves, A. (2009) The fourth way of educational reform. *ACEL*, 45(9): 30-50.

1998)所说的,“教学是促进学生学习结果的一个首要因素”^①,“当考虑理解男孩和女孩之间成绩差异的两难苦恼时,这同样重要”^②。

问题是,当前不少课堂教学变革至少存在着两大问题。第一,教学脱离当下学生的实际,脱离学校生活。针对这样的问题,不少学者早就告诫说,“教学不能脱离学校生活而存在。特别是教师所从事的课程的本质(特性)对学生能获得什么样的结果有重要影响的”^{③④},“同时,学校对不同群体学生所采取的组织惯例也会对学生的学习效果产生重要影响”^⑤。因此,在承认学生学习受课程与学校组织惯例影响的同时,人们也必须认识到,学生所受的影响要通过它们对学生的鉴别与满足学生的学习机会才能实现,也就是说,课程与学校组织的惯例对学生的影响是通过教学与评价行动(即教学方式)才能发生的。第二,不少课堂教学行为变革存在为变革而变革的倾向,不考虑教学行为变革的适当性问题,没有与提高学生的学习结果联系起来。显然,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认识还不够,还没有充分了解到底什么样的教学行为才真正可以促进学生学习效果的提高,“教学研究历史充满了各种研究。这样的研究要么是无法达成这个目标,要么只是

① Hill, R. W. & Rowe, K. J. (1998). Modeling student progress in studies of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School Improvement*, 9(3): 310-333.

② Rowe, K. J. & Rowe, K. S. (2002). What matters most: Evidence-based findings of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and outcomes for girls and boys throughout thei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ing. Melbourne: ACER. (available through <http://www.acer.edu.au>)

③ Teese, R. (2000). *Academic Success and Social Power*. Carlton North: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p. 33.

④ Teese, R. & Polesel, J. (2003). *Undemocratic Schooling*. Carlton North: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p. 280.

⑤ Lamb, S. & Fullarton, S. (2002). Classroom and school factors affecting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using TIMSS. *Australian Journal of Education*, 46(2): 154-171.

达到非常有限的成功”^①。

情况确实如此。从1997年开始,澳大利亚的“教育昆士兰”(Education Queensland)领衔并代表昆士兰州教育与培训部开始了一项历时3年(1997—2000年)的“昆士兰州学校改革深度研究”。在历时3年的研究中,共有24所州学校(其中11所小学,1所从学前到10年级的学校,12所中学)参加了该项目。根据“智力品质”、“联结性”、“支持性课堂环境”及“区别性的认同”,项目研究委员会共观摩了975节课堂教学实践课。尽管只是昆士兰州的个案,但由于该州的教育比较发达,因此该项目的研究结果有一定的代表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该项目的研究发现可以说明整个澳大利亚的教学现状。

研究发现,当前澳大利亚学校课堂教学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第一,社会对学校的援助与学校的输出(学生学习效果)之间的比例失衡。第二,学生学术质量有下降的趋势,同时教师的关注焦点仍然集中在基础技能上,没有将重点延伸到更高层面的思维及更大数量的与学生的对话上。换言之,许多教师没有将关注焦点转到更富有成效的教学方法、评价策略及学生的学习效果上。第三,来自不同课堂行动的教师存在着不适当的认可问题。譬如,大多数教师能够认出与性别、语言、特殊需要及文化差异性相关的问题,但很少有教师能够发现群体性的特殊策略并用这些策略来解决学生的多样化问题。以下是当前澳大利亚学校课堂教学方式存在问题的概述:

(1) 校本管理方法与提高学生结果之间没有强有力的联系。

(2) 部分学校、学校校长、教师及某些教学方式可以对学生学习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3) 高水平且富有成效的课堂行动(教学方式与评价)、高水平的学校组织能力的提升及高质量的外部援助可以促进学生学习成效的提高。

^① Gage, N. L. (1978). *The Scientific Basis of the Art of Teaching*.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p. 11.

(4) 学生在学习措施上的总体能力水平及富有成效的课堂实践的总体水平并不高。

(5) 对课堂环境的社会性援助的平均等级水平远高于其他方面。

(6) 在有记录的课堂实践上,其明显的差别性认可度有限。

(7) 那些生活在社会经济水平较低地区的学生及那些生活在具有更高比例的土著居民中的学生,他们当前使用的是更低成效水平的教学方式。实际上,高质量教学的不公平分布主要与学校规模相关而不是与中小学之间的差别相关。

(8) 6—8 年级使用更有成效的教学方式的比例有显著下降的趋势,尤其是在社会经济水平更低的地区及在中学高年级课堂上。

(9) 质量与教学方式的特性与教师评价实践的特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性。

(10) 通过对教师的访谈,从较低层面评价任务的智力素质的需求来看,大多数教师并不一定把良好的评价行动看作是良好课堂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11) 尽管那些在教学方式的各个方面都持续富有成效的个体教师们确实在研究中确实得到了认可,但大多数参加实验的样本教师得到的评价都不高。

(12) 高智力需求及社会性援助都在提高学生的学术性结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3) 在富有成效的教学措施上得到较高评价的教师的共同特点是:①有责任感;②显示了提高学生学习结果的效能;③对教师角色的概念有充分的理解;④对课程有充分的理解。

(14) 与得到评价较低的教师相比,尽管得到评价较高的教师更多地承认他们不能强迫学生学习,但他们仍然考虑到不但要对学生学习负责(特别是要对提供学生学习机会负责),而且要把所有的学习者看作是学习成果能够得到提高的个体。

(15) 与更普遍使用、富有成效的课堂教学方式之间存在强有力联系的主要可变因素有三种:①教师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关于学生学习

的集体责任;②学校范围内实施专业学习共同体的整体水平;③针对教学方式的领导的力量。

(16) 学校中富有成效的领导往往对教师设置了更高的教学要求,这反过来也会促使教师在课堂上更大程度地使用富有成效的教学方式。

(17) 为提高教师的能力,无论是校内还是在校外,教师的专业发展都是需要的,通过专业发展可以系统性地增强个体教师这种人力资本的素质并改进学校的组织能力,以此来传递本已得到提高的学生的学习结果。

(18) 学校委员会在校本管理中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19) 教师自己把基本技能看作是其最重要的发展重点,而把智力投入与需要看作是次要的发展重点。

(20) 尽管教师在态度及信仰上有很大的差别性,但也有一些共同的错误似乎在抑制着教师采用富有成效的教学方式,譬如:①不少教师把行为管理看作是在课堂实践上的重点发展的问题,实际上,有效的行为管理是寓于富有成效的课堂行动当中的。②有些教师认为,较高的智力需求及社会援助必须得到改变以换取各自的支持,而非需要协同增效与互相产生成效。①

面对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加涅(Gage, N. L.)认为,教与学紧密相连,当所有教师实践同样的教学原则(譬如,告知学习者学习目标、指导注意力、激发记忆、促进学习的迁移产生及能力表现与提供反馈)时,提高学生学习结果是可能的。②

斯奎尔(Squires, A.)也认为,教学方式标准规划是重要的。他说,如果教学行为标准具体规定了某个群体学生应知、能做的东西,得到广泛的传播与接受,被用来指导教学,并联结重要的评价的话,那么

① AISQ Research Brief, Issue 2, 2002. <http://www.aisq.qld.edu.au>.

② 转引自 Gredler, M. E. (2004).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Theory into Practice* (5th edition).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68—169.

学生的学习结果就有可能得到提高。^①

于是,澳大利亚从2005年起就开始了对教学行为有效性评价标准的研究。其研究目的有四。

第一,澳大利亚希望通过制订这样的标准,为从幼儿园到12年级各个关键学习领域的课堂教学提供具体的规划,以便使学校和社区明确高质量教学的要素和达到这些要素的步骤,从而为各层次的课程领导者提供一种参照,一种标准。通过这样的标准,州教育与培训部的官员可以用来评估与指导学校的教与学;同样,通过这样的框架标准,包括教师在内的学校的课程领导者可以联系课程标准、结合具体的课程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并最终达到提高学生学习效果的目的。

第二,支持学校领导者与教师的工作,帮助他们应对澳大利亚学校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②

第三,为课程领导者提供一种经过各方面共同协商并认同的模式。澳大利亚相信,当存在一种得到各个利益相关人员共同强调的学习时,学校有可能达到提高学生学习效果的目的。如果教师运用经协商而达到一致的学习理论的话,就存在整个学校范围内的系统的强化。当存在学科与文本及教师之间方法上的一致性时,所期望达到改进的东西就很有可能得到保证,也就是说,学生学习效果的提高就存在着可能性。

第四,为教师提供一种反思性手段。作为一种自我反思的工具,教师可以运用该框架标准来帮助他们理解、分析与强调他们自己的教学行动,从而达到改进学生学习效果的目的。譬如,教师要反思:
① 对正确的能力表现是否进行了强化及奖励;
② 是否有教学性提示、投入与纠正性的反馈;
③ 是否进行了个性化学生指导与适应性教学。

澳大利亚地处大洋洲,位居东西文化的交汇处。从历史上看,“澳

① Squires, D. A. (2005). *Aligning and Balancing the Standards-Based Curriculum*. Thousand Oaks, CA: Corwin Press, p. 52.

② <http://www.curriculumsupport.nsw.edu.au/qualityTeaching/docs/QualityTeachingEpsColor.pdf>.

大利亚奉行实用主义哲学”^①。一方面,由于深受英美价值观念的影响,它努力保持其英美的思想文化传统;另一方面,由于它也受到亚洲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它也希望尽快地融入到亚洲的文化内。特别是在当下这个快速变革的环境下,澳大利亚的经济和社会与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融合得到不断深化。譬如,澳大利亚的专业人员与其他国家(地区)的人们在线合作参与政府项目的现象正日益普遍。同时,澳大利亚的语言与文化背景也不断走向多元化。亚洲国家已经对全球化整合的挑战作出了应对措施。譬如,在用国际性网络武装自己,以及掌握“穿越跨文化空间”的能力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亚洲学生正将西方社会强大的文化知识与他们自己的国家及他们所在的地区结合起来。澳大利亚需要同样高层面的跨文化意识。文化性素养不但意味着要改变、超越亚洲那种虽然贫穷但却具有清晰传统文化惯例的特点,而且也意味着要转变那种全球化与商业主义已经导致了一种同质的国际性文化(其符号特征如星巴克咖啡文化这样的品牌)的其他概念误解。文化素养包含世界观知识、其他人民的文化背景,以及对人们自己文化偏好的意识与自己在社会交往中的潜在性影响的认识。研究表明,有效跨文化交际者的特点是同样拥有“高度发展的技能、移情、自我意识及容忍歧义”,并因此让他们接受多样化的观点。这些特性反过来又通过详细研究其他国家(地区)的文化而得到发展。^②

我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为适应“‘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需要,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提高质量。为此,要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深化课程与教学方法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力图实行“全球化视野,本土化行动”课堂教学行为变革的中国来说,研究澳大

① 王斌华. 澳大利亚教育.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IV.

② Beasley, T. (2009) A rapidly changing context. *EQ Australia*. 45(10):6-8.